



引 言

一、团结与进步——藏族历史的回眸

扑面而来的是 21 世纪。

这 21 世纪确实是崭新的时代。冷战阵营结束，对峙壁垒冰消。一个多元的、多中心的世界格局逐步建立。这对于多灾多难、坚忍不拔的中国人来说，既充满了希望和机遇，也密布着挑战和困惑。不管怎样，我们无法回避，也无需退让，总要挺起胸膛，面对着这个轰隆隆急驶而来的新的时代列车。

我国有着绵延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至今还是光辉灿烂，耀眼炫目。近一百五十多年来，蒙受深重苦难，备尝艰辛，充满了血和泪的悲惨遭遇。虽然饱经忧患，屡受折磨，仍然屹立于

世界之东方，不夺其青云之志，未减其昂扬之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屡经剑与火的考验，腥风血雨，锻炼了各族人民报国的意志；刀光剑影，激励了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前仆后继，越战越勇，从失败的教训中聪明起来了，干练起来了。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共和国的建立，一次次尝试、挫折，再尝试、拼搏，终于以巨人般的姿态展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这关键取决于我国各族人民蕴藏于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今以西方人士颇为“关心”、屡发议论的西藏为例试说明之。

7世纪，藏族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崛起于西藏几个河谷地带的农业文明，把悉补野家族推上了主导地位。几代赞普励精图治，蓄锐养精，革旧布新，日益壮大，开拓疆土，兼并部落，最终威武雄壮的吐蕃政权和大唐王朝建立了以婚姻关系为基线的政治联盟。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位杰出的大唐皇裔先后远嫁吐蕃，奠定了唐蕃友好亲情。唐蕃和盟成为千年佳话，“和同一家，世为甥舅”。千年来，彪炳于史册的“唐蕃会盟碑”至今矗立于拉萨，垂范于后世。就在这一时期，创制藏文翻译经典，《尚书》、《战国策》译成藏文，《史记》故事也在藏区普遍流传。吐蕃上下雅爱唐风，从典章制度到衣着服饰，大唐文化将吐蕃社会带进了一个文明的、繁荣的、雅致的、充满了向上精神的新时代。

此后，绵延了几百年的分崩离析局面，社会进步受到了阻滞，十分令人惋惜。

13世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元朝是一个英雄时代。重新统一的藏族社会成为大元帝国的一个坚强的成员，分享了时代的光荣。元朝中央和西藏地方领袖合作，敕立13万户，修筑驿站，清查户口，测绘地图，第一次编定了《藏文大藏经》，建筑技术空前提高，一座座壮丽的寺庙，金碧辉煌的殿宇拔地

而起。历史专著、戏剧、文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团结、统一的西藏社会迈向了新的文明的高度。

明继元统，以“众建多封”政策，团结西藏的各教派和各地方领袖，出现了著名的明封八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护教王和赞善王）。代表西藏文化精英的高僧大德进京朝见，络绎于途。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以宗教和贸易两个方面开拓了新的交流孔道。茶马互市，盐粮交换，丝绸瓷器流向藏区；药材、矿产转来内地。印刷术传进了西藏，使藏文得到了普及应用。一批藏文巨著成为当时最高的学术成就，几位著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在内地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是以满族为主导的新的政权，在前几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了与西藏地方的团结，巩固了统一。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在最高层次上密切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五体清文鉴》的编辑，《西域同文志》的出版，那塘版、德格版与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遥相辉映。藏文历书的颁发，藏医院的设立，《世界广说》的出版，说明藏族的数学、医学和地理学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团结统一的条件下出现的。

1951年5月23日，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空前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达成并签字，受到举国上下各族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喇嘛都以热情洋溢的电文表示他们诚恳的、由衷的拥护和支持。1965年西藏自治区建立，“文化大革命”后西藏大学和西藏社会科学院设立，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蓬蓬勃勃。特别是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在西藏的实施和全国各省市人民政府的支持，西藏的发展日新月异，令世人瞩目。

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等大喇嘛的转世、寻访、确认、坐床，一系列的符合藏族宗教和民族习惯的安排，都是在中央政府指派大员主持下完成的，满足了藏族人民的心愿。江泽民同志所题“护国利民”的匾额最透彻不过地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宗教和宗教领袖的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西藏成功的实施，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在西藏的体现，又是我们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高度发挥。我们确信无疑的是，“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古训，将在新的时代以中国特色的面貌深入人心。

二、近年来我国藏学研究一瞥

藏学(Tibetology 或 Tibetan studies)是研究藏民族的专业学科。藏族，作为中华民族 56 个成员之一，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青藏高原上，主要分布在我国境内的西藏自治区及川、甘、青、滇四省的藏族聚居区。藏族的故乡在中国，藏学的故乡当然也在中国。

一般认为我国对藏学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隋唐，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古代，那时，学者曾留下一些对藏区山川风物人民习俗之记载。就语言文字而言，我国学者都认为 7 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的文臣吞弥桑布扎的《藏文文法根本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是首创性的专著。西方世界研究藏学的创始人匈牙利学者亚历山大·乔玛(1790—1842)在 1834 年发表其《藏英辞典》和《藏文文法》两本专著，这是西方社会研究藏学的发端和津梁。不妨把我们过去的藏学研究称为传统藏学，而运用现代人文科学的手段，借鉴历史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新的方法来研究的藏学称之为现代藏学。

由于过去旧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国事日非，外敌环伺，边疆多事，民无宁日，当时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维护祖国统一，去研究中国边疆的学问，而研究藏学却非得要远渡重洋，留学海外不可。最为典型者是中国藏学的创始人之一于道泉先生（1901—1992）。他就远赴法国巴黎大学师从巴考（J. Bacot）教授苦读了五个春秋，专攻藏学。在此之前，在北京，他已发表了专著《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情歌》（1931年），此书可以看做中国现代藏学的发端之作。此后在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里，一批学者如韩儒林、闻宥、任乃强、李安宅、于式玉、黄明信、王沂暖、金鹏、王森、苏晋仁、柳陞祺、吴丰培、释法尊、刘家驹、庄学本等，他们就各自所长，利用当时的条件投身于藏学，开始进行专门性研究，发表过一些重要论著，开了中国藏学研究的先河。

1949年建国伊始，就在北京筹备并于1951年正式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率先创办藏语专业，由海外归来的于道泉教授主其事，成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藏学人才最早的摇篮。在这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藏学人才，其中有的如今已是蜚声中外的学者。在经历了惨痛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挫折以后，到了1978年，人们呼唤已久的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中国学术界再度焕发出青春活力，中国藏学事业随之再度振兴，西藏大学的建立，西藏社会科学院的组建，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西南、青海等地民族院校及社科院开始招收、培养藏学专业研究生，一批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他们在老一辈藏学专家的指导下，迅速出现一批观点新颖、立论正确、论证严密的成果，其中有些填补了藏学研究的空白，已为中外学界重视。

今天看来，可以这样说，经过数代藏学学者（包括汉、藏、蒙、满和其他民族）长期不懈、艰苦卓绝的努力，学者们已经为中国藏学事业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中国堪称当之无愧

愧的藏学故乡，这方面已有专文介绍^①，此处我们只就近几年来中国藏学的发展状况做一概述。

（一）中国藏研中心的成立和发展

近 20 年来，经过改革开放，奋发图强，中国藏学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飞速发展，一批新的研究机构陆续成立，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发展。这期间成立的新的研究机构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四川国外藏学研究所、四川藏学研究中心、甘肃省藏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现升格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等，为藏学人才的培养、藏学研究广泛深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 1986 年 5 月 20 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藏学已迈入一个崭新时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藏研中心”）成立的根本宗旨是研究以西藏为主包括其他藏区在内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问题，培养藏学研究人才，组织、协调全国的藏学研究工作，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繁荣和发展我国藏学事业，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服务。经过十年来的发展，藏研中心已成为颇具规模的藏学研究机构。藏研中心成立后，在科研、出版、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藏研中心下设部门中有社会经济、历史、宗教、当代等四个专门性研究所，十年中他们承担了一批国家重点课题，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研究》、对勘本《中华大藏经 藏文部分》、《西藏拉萨现存梵文

^① 如王尧《中国的藏学》及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ibetology In China*，载拙著《藏学零墨》台湾佛光出版社，1992 年版；杜永彬《中国近十年来藏学人才培养的反思》载香港《法言》，1990 年 8 月号。

贝叶经的整理、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国情丛书·拉萨卷》；国家科委“攀登”项目重点课题《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1995年度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西藏农民的生活——以帕拉庄园为中心的调查研究》；1995年度青年社会基金课题《藏区特殊语言研究》等。在藏研中心内创办了中国藏学出版社，从1987年至今，已出版图书222种，总数约93万余册，其中有多种图书获各类图书奖。还参加了海内外各类书展，颇受好评，反应良好。《中国藏学》杂志社自1987年10月创刊至今，共发刊藏、汉文版各50期，发表各类论文、文章1000余篇。该刊现有国内订户2000余家，海外订户125家，覆盖美、英、法、俄、日、德和台湾、香港等11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藏学领域国内外有名的档次较高的专业性刊物。

资料工作方面，在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藏、汉文档案资料，已公开出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7卷本）、《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铁虎清册》等书共约500万字，为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1991年至今，藏研中心还连续主办了有众多的国际友人参加的北京中国藏学讨论会三次。十年间多次派人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考察、访问、进修和讲学，以及参加国际书展等；同时接待外国及港台学者数百人次。这些不但增进了藏学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国外学者客观、公正地看待、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和我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方针、政策。中心成立的十年，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同国际反华势力及分裂主义集团激烈斗争的十年。在此期间，藏学中心全体科研人员紧紧围绕反分裂斗争这一主题做了大量工作，以翔实的史料和

严谨的论述，从不同角度揭露和驳斥了国际反华势力和分裂集团在西藏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谎言。在十世班禅转世灵童认定的关键时刻，发表了《论清朝金瓶掣签及其历史意义》等一批旗帜鲜明、论证缜密的学术研究成果，产生了极好的社会效果。

总之，17年来藏研中心在对西藏及其他藏区重大理论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研究、藏学家的培养、藏学书刊的出版、全国藏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对外交流、资料建设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藏研中心的十年业绩是这期间中国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藏学论著的出版

近十年来，中国藏学研究领域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出版了一批论著，取得了相当辉煌的学术成就。

1. 刊物（包括丛书）

《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中国西藏》等藏学专业刊物继续刊发了大量论文，《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北民族研究》、《西北民院学报》、《青海民院学报》以及有关省级社科刊物等也刊发了一定数量的藏学文章。单就《西藏研究》（汉文版）而言，从1986年至今，就出版了50期，刊发文章千篇左右，涉及藏学领域的若干分支领域，如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医学及史料信息等。所发文章中，有不少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中国藏学》已在上面做了介绍，兹不赘。

中国藏学出版社推出的《西藏知识小丛书》，已出版《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的关系》（邓锐龄）《西藏的教育》（多杰才

多杰才旦：《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6年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介绍手册也谈及该中心的成立与发展。

旦)等十几种通俗易懂的小型专书,对藏学知识的普及、宣传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藏学研究论丛》(编委会由北京、青海、甘肃、四川、陕西、西藏等地部分学者组成),自1989年5月出版至今,已出版6辑,共刊发近150篇文章,其中不少篇目论证严密、分析精到、结论合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比如《释明代梵、藏、汉文法被图》(王森第1辑)、《元代萨迦本钦辨析——兼论元代西藏地方的行政体制》(陈庆英,第2辑)、《吐蕃远古氏族“恰”、“穆”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26 II解读》(褚俊杰,第2辑)、《唐蕃使者之研究》(苏晋仁第3辑)、《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王小甫,第3辑)等等。

四川藏学研究会杨岭多杰等主编的《四川藏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则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主要刊发四川藏区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文化、藏医藏药方面的文章。自1993年起至今,已出版五辑,刊发了近50篇学术论文。

中央民族学院藏学所编辑的《藏学研究》迄今已正式出版7辑,刊发文章120多篇,主要是历史、宗教、文化方面的学术论文,也有适量的人物评介文章。有些文章对藏学史上某些悬而未决的、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对藏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除了1982年第1辑刊发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之外,1986年以来的八年中又刊发的重头文章有《三探吐蕃卜辞》(王尧、陈践,1986年第4辑)、《雪山草原间的神灵家族——藏族神灵论》(丹珠昂奔,1987年第5辑)、《山东长清大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铭考释补证》(王尧,1993年第7辑)等。

1999年开始了一个新的藏学研究丛刊《贤者新宴》(mkhas - pavi - ston - gsar),已出版了第三辑,包括语言、历史、宗

教与哲学、文化艺术和书评五个栏目，收录 50 篇文章。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藏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加，国内外相互借鉴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日趋突出。在此背景下，1985 年~1986 年间，有热心的同志组织人力选译国外藏学名作、名篇，编为《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集。从 1986 年 2 月出版第 1 辑至今，已出版 20 辑，共发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近 240 篇，约 500 万字。该文集的编辑和出版，不但对中国藏学研究起到了良好的借鉴和交流作用，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对外藏学翻译和研究人才。

2. 专集专著（含辞书和个人文集等）

十余年来，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青海、四川、甘肃等地的民族出版社也出版和再版了与藏学研究相关的各种汉、藏文史料、专论、辞书及个人专集等近千种，这里只能择要简介：

语言文字方面：《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周季文等）《拉萨口语读本》（胡坦等）《实用藏文文法》（格桑居冕）《嘉戎语研究》（林向荣）《拉萨口语语法》（王志敬）及《藏汉大辞典》（张怡荪主编）等书的出版，对藏语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对藏语研究的深入开展都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此外，藏研中心还承担了 1995 年度青年社科基金课题《藏区特殊语言研究》等。上述尤其值得介绍的是《藏汉大辞典》，全书藏汉双解，收词目 53000 余条，是目前国内外收词最多、部头最大的百科全书式的藏语文工具书，深受国内外藏学界的欢迎。它是集数代若干学者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它的编辑出版在藏学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但推动了藏语言的研究，而且也为藏学其他所有领域的研究者带来益处。此书 1987 年获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一等奖。1993 年再版改为 32 开缩印本，分

上、下两册。

藏语言的研究，实际上是在罗常培、王力、袁家骅、傅懋勋、罗季光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教导下结出的丰硕成果，如今年富力强、学有所成的藏语专家有许多都曾直接受教于他们。由于老一辈专家强调语言实践和口语训练，中国的藏学专家们一口流利的藏语更是令国外藏学界叹服。近十年来，藏语研究逐步深入，取得了某些新的成果；声调研究继续为人们所关注，并有所突破；同时语法研究也有某些成就；综合性和专科性藏语辞典陆续出版近 15 种，意味着藏语辞典学的繁荣；方言的描写研究正在逐步展开，出版了一些方言辞典，这些都为藏语研究带来了新的可喜景象。方言间的比较研究、藏语史的研究、汉藏语系语言间的比较研究等著述相对较少，依然具有广阔的前景；但这些课题难度较大，学者们已经认识到，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除了要对各主要方言进行详尽的描写外，还应根据文献资料编撰断代藏语辞典，有了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才能谈得上藏语史和藏语方言的历史的比较和研究，尔后才有助于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研究。因此，这些领域尚待学者们进行艰苦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索。

历史（宗教）方面：藏族历史（包括宗教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藏文（及汉文）史籍的发掘、整理和翻译出版。近十年来，这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翻译出版（含再版）《青史》、《红史》、《新红史》、《王统世系明鉴》（又译《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土观宗派源流》、《萨迦世系史》、《萨迦世系史续篇》、《郎世家族史》、《安多政教史》（又译《多麦教法史》）、《雅隆尊者教法史》、《印度佛教史》、《米拉日巴传》、《颇罗鼐传》、《贤者喜宴》（节译）等等，编辑刊印了《册府元龟吐蕃史料笺证》、《资治通鉴吐蕃史料》、《藏族史料》（一〇二〇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

案史料选编》（7卷本）、对勘本《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等重要著作，为藏族史和藏传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专书有如《藏族史略》、《藏族史要》、《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安多藏族史略》、《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蒙藏关系史研究》、《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吐蕃文化》、《丝路文化·吐蕃卷》、《宗喀巴评传》、《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藏传佛教发展史纲》、《藏传因明学》、《元朝帝师八思巴》、《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等；个人专集有《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李安宅藏学研究文选》、《西藏文史考信集》（王尧）、《藏史丛考》（陈楠 筹。上述专书中《吐蕃文化》系吉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库”之一，《宗喀巴评传》系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思想家评传”200种之一。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翔实地以史料求证，用历史语言学方法研究藏传佛教史的杰作。它虽然在1987年才正式出版，但早在1965年4月即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社会历史室编印成册流传和影响于学界，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则以翔实而丰富的史料，严密而科学的求证，严正而有力地驳斥了国外某些错误论调，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自13世纪起西藏地方就已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历史事实。而个人专集则是不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学术生涯中的精选之作，既反应了不同时代的学术背景和风格，又反映了学者不同的学术个性和研究方法。由西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编撰的《西藏通史》藏文本、汉文译本，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三人合著：《西藏历史地位辨》，1995年9月，民族出版社出版。石硕著：《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极为重要的三部新作，已受到多方面的重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小雅·鹤鸣》）近十年来，中国藏学界不但出版本国学者的著述，而且一如既往地重视国外藏学名著的译介工作。中国藏学出版社专门推出“汉译国外藏学名著丛书”，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藏学译著。如《西藏的贵族和政府》、《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西藏的文明》、《西藏研究文献目录》、《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现代西藏的诞生》、《西藏的鬼怪和神灵》、《喇嘛王国的覆灭——西藏现代史》、《西藏佛教密宗》等大批译著，它们对中国藏学的研究方法、史料的运用和分析等均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近年来基本上同过去一样，中国藏学界“对于西藏历史的研究平面铺叙的较多，整体流动分析探索较少，旧史料重复沿袭较多，新资料的发掘较少，故藏族史的研究尚有待深化，而宗教研究并不平衡，本教（即佛教以外）的研究，竟成为空白状态，至今还没有一本专书。佛教研究亦缺乏具有哲学高度的深入探索，对于藏传佛教的思辨性理论如何为狂迷的实践所掩盖，以及其他若干思想、意义和义理上的特点也有待深入（研究）”。藏族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重要历史人物和大学者。目前只对其极少数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有关传记，但还远远不够，尚需加强。如果说不同之处，就是近十年来藏族史研究的重心有所转移，着眼于元以后的著述中的优秀作品较多。

文学方面：1986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族文学史》，可以说是该领域的总结性成果。该书的编写任务是中央民族学院藏语教研组1959年就接受了的，几编几改，近30年后才得以正式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有众多学者的辛劳和汗水。已故的佟锦华的《藏族古典文学》提纲挈领，简明通俗，有利于藏族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此外，一批多层次的藏族文学作品如民歌、民间故事、藏戏及藏族历史人物传记（如《米拉日巴传》等）的翻译和出版，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学研

究的园地。而世人瞩目的《格萨尔》研究，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王沂暖先生就从事搜集和翻译，全面的研究工作则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科院成立了全国格萨尔王传工作领导小组。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北京、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省市有关出版社纷纷出版藏、汉文本《格萨尔王传》，计有 50 余部，基本上完成了搜集整理工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这部伟大史诗的研究已在全国形成一定规模，《格萨尔研究集刊》的出版使许多优秀论文得以问世，并在国际藏学界产生影响；但是，研究工作有待向纵深发展，研究队伍有待全面协调，这样方可避免盲目性和重复劳动。

敦煌吐蕃文献研究：这是中国敦煌学的重要分支，专门研究敦煌藏文写卷，即收藏在敦煌千佛洞石窟中的古藏文写本，包括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等窃去国外的写卷在内，共约 5000 个卷号。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于道泉先生游学法、英时，就曾收集了一批写卷的缩微胶卷带回国内；尔后又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一部分敦煌古藏文写卷的影印本、复制件及其出版物，有如巴考等人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法国版《敦煌吐蕃文献选集》（I、II）等等。中国学者正是在对这些古藏文写卷进行释读的基础上，分析、研究藏族古代语言、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王尧、陈践）是此领域国内的首部力作。由于此书有助于藏学诸多领域，历史、文学、语言、宗教、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所依托，颇受国内外学术界青睐，1992 年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它的增订本，改原有的 32 开本为 16 开本，内容、体例、装帧等方面都面目一新。此后，我与陈践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敦煌吐蕃文献论著，如《敦煌吐蕃文献选》、《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释读》、《吐蕃简牍综录》、《吐蕃文献选》等等，并就若干写卷发表了关于吐蕃兵制、法

制、官制以及占卜术、医术等一系列的论文。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能解读、分析、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的青年学者继续深入探索。

在研究敦煌写卷的同时，还对吐蕃时期的金石碑铭进行了搜集、翻译和研究，1982年文物版的《吐蕃金石录》（王尧）是国内在此领域的开创之作。李方桂、柯蔚南先生合著“*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一书时，它成为这一领域最全面的、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国内学者解读、翻译和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的文章，散见于各类刊物的已有近百篇。敦煌写卷涉及面很广，有历史、宗教、语言、文化、医药、法律、占卜等方面；加上当时唐蕃特殊的关系，其内容有好些还与古代汉文典籍有关。因此，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必然要求研究者有良好的藏、汉文语言、历史、宗教等知识基础；要将这门学问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就有必要发现和培养有志于斯的青年人才，这样方可继往开来、日益发达。

值得一提的是，民族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 P. T. 写卷解题目录》（王尧主编，陈践、褚俊杰、熊文彬、王维强编写，王启龙协编），成为国内第一部关于敦煌藏文写本研究工具书。此外《敦煌本吐蕃文书集成》、《唐代藏语词典》等项也在准备之中，可望在不久撰成出版。

藏医药及藏族科技研究：这方面近十年又有一定数量的论述问世（包括上述《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释读》），但与其他传统学科如历史、宗教相比，却颇失衡。就以《中国藏学》（汉文版）为例，自从创刊以来，藏医药和科技方面的研究论文只发表了6篇。另据《中国藏学》1995年第1、2期所刊《1994年全国藏学研究论文资料要目索引》（上、下），1994年全国

报纸杂志发表了近 700 篇文章，其中，医药卫生类只刊发了 6 篇，科技（建筑）类只刊了 11 篇。由此看来，藏医药和藏族科技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亟待重点扶持、全面加强。

政治经济研究：这方面在近十年来得到了大力加强，可谓硕果累累。《中国藏学》自创刊以来，所发表的近千篇文章中，就有约 200 篇属于此类。这些文章大多结合社会历史对西藏及其他藏区的政治、经济现状进行考察和研究，直接服务现代藏族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在此期间，全国出版的藏学著作中，属于此类的至少占总数的 1/4。其中有些是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比如藏研中心的《中国国情丛书·拉萨卷》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属国家科委“攀登”项目重点课题等；有些是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结合，相互论证，对某些社会历史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比如《迪庆藏族社会史》、《果洛藏族社会》等属之。这些成果资料翔实、多数直接来源于对藏族现实社会的第一手调查，又直接服务于社会。相信今后这方面的研究还会得到拓展和加深，将会变得更加成熟和发达。

（三）人才培养

近 20 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推动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中国藏学研究也不例外。除了 1986 年前已建立的西藏社会科学院、青海社会科学院藏学所、中央民族学院藏学所之外，1986 年以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省国外藏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四川藏学研究会、甘肃藏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和团体相继建立。这些单位同前文所述的众多刊物和有关出版社等，为发现和培养藏学人才提供了宝贵的环境。自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全国各地已经招收百余名藏学的硕士、博士生，其中有近百名是 1986 年以来的十年内招收和培养的。他们中有许多在老一代藏学家

的培养和指导下，已成为有关研究机构的业务骨干和专家。格勒、熊文彬、周炜、谢继胜、张云、杜永彬、苏发祥、王启龙等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他们的科研成果有些具有创见性，填补了某些空白，为中国藏学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带来了勃勃生机。

尽管藏学人才培养单位和老一辈藏学家们都非常重视从语言入手，培养青年藏学人才的基本功，但由于长期存在的历史和传统方面的诸多因素，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还存在较大差距，故而近十年来藏学人才的培养方面根本性的变化不多，藏族学生的汉文修养和汉族学生的藏文基础都有待加强。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学术领域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汉、藏两族有志于藏学研究的学生都有必要真正掌握一至两门外语，才能满足今后日益增多的对外学术交流的需要，才能知彼知己、扬长避短。

人才培养的格局也没有重大改变，历史、文学、语言方面依然占重头；而藏医药及科技方面研究人才的培养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依然冷清，需要全社会和藏学界的鼎力支持和帮助。相信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藏学人才培养的格局会日趋合理。

概而言之，近年来中国藏学研究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喜成就。随着以藏研中心为代表的一些新的藏学研究单位的相继成立，藏学出版物也相继增加，藏学人才的培养规模也有所扩大，藏学领域也在不断拓展，藏学领域的对外交流也日渐增多。可以说，新中国的现代藏学研究已经突破传统藏学大、小“五明”范畴^①，发展成为对藏族及其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历史、语言、

^① “明”是梵文 *vidya* 的意译，原意为学问，来源于古印度佛教。大、小“五明”是教授学徒的两种学问系统。大“五明”包括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小“五明”包括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